

新世纪古文献学研究的交叉与综合

周少川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古籍的整理和古文献学的研究呈现可喜的局面。然而,在作为传统学科的古典文献学领域,古代先贤已作出令人叹服、甚至有的是难以超越的成就。因此,新世纪文献学要有大的发展,应该注意交叉与综合研究,方能开拓出新视野和新领域。本文拟对新世纪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就加以概括,并就古文献学研究的新趋势略陈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新世纪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就

2000年以来,古文献的整理、古文献学的研究成就显著。其中,出土文献的研究、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域外汉籍的搜求等热点持续升温。总结古籍整理的经验,分析古文献学研究中重点、热点问题的成绩与不足,是展望古文献学发展远景的必要前提。古文献整理研究近十年来有几件大事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一是国家启动了古籍保护计划。200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从国家发展规划的十一五阶段开始,用10年时间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并从2007年起,用3-5年的时间在全国进行古籍普查,搜求古籍善本,调查古籍现存情况和破损情况;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开展对古籍的修复和保护工程。至今,已公布了三批近万部“国家珍贵古籍”;同时分两次公布了117个“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保护工作正向纵深展开。

二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历经几个五年计划的辛苦工作,将于2010年最后完成。该目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综合目录,旨在全面反映目前国内外现存汉文古籍的主要品种、版本及收藏单位。全书分经、史、子、集、丛书5部,著录以古籍品种立目,同时反映入录各书的主要版本,全书收录古籍19万馀种之多,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往认为我国现存古籍15万种左右的估计。

三是由国务院批准,开始于1990年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在2006年重新启动。这部汇集1911年以前古文献资料,运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编纂的新型类书,徵引古代典籍2万多种,内设《文学典》《史学典》《哲学

典》《文献目录典》等 24 典,总字数达 8 亿,规模超过了《四库全书》,字数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类书《永乐大典》的两倍^①。目前,《中华大典》已先后出版了《哲学典》《文学典》,其他各典正加紧编纂,将于 2012 年最后完成。其中的《文献目录典》更是与文献学研究密切相关,该典的《文献学分典》汇集了古代学者对文献学所属各门专学的概念、方法、功能的论述,收录了各种考辨文献的实例以及文献学史的大量史料。其《古籍目录分典》则以郑樵“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②的思想为宗旨,采取辑录方式,汇聚古代近千种书目的资料,著录一切古代著述。该分典将成为我国第一部古代典籍全目,其不论存亡、一概著录的特点,既可让人们了解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全貌,又可分辨存亡,为亡佚古籍的搜寻提供线索。

四是《清史》编纂的文献整理。本世纪初开始的《清史》编纂工程在撰写的过程中,同时整理了大批清史文献,已出版有关档案、文献、图录、编译等丛刊 96 种 844 册^③,为推动清史编纂,繁荣学术文化做出了贡献。

五是于 2002 年由北京大学牵头启动的《儒藏》工程。该工程也是大型古籍整理项目,选择古代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文献,按四部分类,经校勘标点,以繁体直行排印。《儒藏》先作精华编,再作大全编,目前已完成并出版精华编的部分内容 30 余册^④。

六是其他的一些古籍整理、古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如由中华书局组织的《二十四史》新点校本的编纂,由国家图书馆组织的《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的编纂。此外,还有 2007 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对一批秦简的购藏、整理和研究,2008 年清华大学对一批战国竹简的收藏、整理和研究,2009 年北京大学对一批汉简的收藏、整理和研究,这都是近年出土文献研究的新发现和新成果。

二、古文献学研究的交叉与综合

关于古文献学研究视野的开拓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思考,以前在《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一文中已有所涉及^⑤,凡前文已论者,此处不再详述;凡前文未曾展开或未及论者,此处将加以阐明。大概可从以下八个方面,看

①我国历史上规模超过 500 万字的类书约有 6 部:《皇览》800 万字,《太平御览》500 万字,《册府元龟》916 万字,《永乐大典》3 亿 7 千万字,《古今图书集成》1 亿 6 千万字,《佩文韵府》941 万字。

②郑樵:《通志·校讎略》,见《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 年。

③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整理出版图书目录(2003、7—2009、2)》,《中华读书报》2009 年 2 月 18 日。

④见《〈儒藏〉之境》,《光明日报》2009 年 8 月 31 日。

⑤周少川、陈晓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历史文献研究》总 22 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古文献学研究视野之拓展。

1. 传世文献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

上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大批地下文物和文献被发掘出来,珍贵秘籍重见天日。据统计,百年间约有 170 余批、28 万支不同时期的竹木简出土;另有帛书文献 4 批出土。大批出土文献的发现,大大开阔了学术界研究资料的范围和研究视野,在开展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结合研究上,途径是多方面的。

一是可以利用出土文献的新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开展对古代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等多方面的研究。比如,近年学者们发现里耶秦简所记载的“苍梧”、“洞庭”两郡,为以往秦 36 郡或 48 郡之郡名所无,因而补充了对秦朝行政区划的认识。近来,又有学者利用岳麓书院所藏秦简,提出了秦郡还有“江陵”、“清河”二郡的看法^①。此外,如利用郭店楚简对先秦子思学派的研究,利用长沙走马楼吴简对三国田赋、户口制度的研究,利用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的奏谏书对秦代法律条令的研究,等等。二是可以通过出土文献的实物,对古文文献载体材料的形制、质地的发展变化有重新认识。三是可以深入开展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比勘研究,尤其是一些名著名篇,通过传世本、简牍本、帛书本等多种传本的比勘、校异,甚至笺证,可以深入分析文本变异、差异的原因,以及学术思想的渊源流变,等等。1997 年,日本学者服部千村就曾运用竹简本、和刻樱田本、影宋魏武注本、宋武经七书本等《孙子兵法》进行互勘,在校记中做出考证^②。2000 年国内学者彭浩则用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王弼注本、河上公本、龙兴观碑本等合勘《老子》文句,惜未有校记笺证^③。这些工作都是值得借鉴的。四是针对出土文献,展开古文书学的研究。这是由于出土文献中有大量古代文书档案,运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可以将简牍的书写格式、制作形制、收发渠道、内容类别、档案功能等了解清楚,进一步挖掘其史料价值。五是开展古文字学的研究。汉以前的出土文献皆以古文字书写,为文字学提供了大量古文字的资料,利用传世文献和字书释读古文字,又反过来利用出土文献中的古文字资料考辨以往对古文字训释的疑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有些学者已经利用出土文献开展对古文字的整理,如李守奎等学者所作的《楚文字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5)文字编》等等。

2. 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

文献的产生、聚散,文献学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发展密切相联的,因此,文献学史的研究如能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会相得益彰,有利于加强文献学史研究的分量。

①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

②[日]服部千村:《孙子兵法新校》,白山出版社,1997 年。

③彭浩:《郭店楚简〈老子〉校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笔者在做《藏书与文化》^①课题的研究时就尝试了文献学研究和文化史、社会史结合的方法,从而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以往的私家藏书研究由于未能有准确的定位,因而往往局限在藏书家事迹的研究范围里,其结果仅能反映一朝一地私家藏书的概况,而不能了解其更深层次的内容。然而,如果从多重视角来研究私家藏书,便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置于社会历史环境的总相中进行考察,分析社会历史环境中生产技术、经济水平、文化风尚、人文地理诸因素,与这一文化现象彼此间的相互关联,作用与反作用。比如,考察其与社会生产经济因素的关系时,可从“造纸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看典籍生产技术的变化对私家藏书的影响,认识私家藏书事业两次飞跃发展的原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生产技术一样,同属于私家藏书文化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私家藏书事业繁荣的前提条件,它使藏书家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来投入藏书活动;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促进图书这种特殊商品的流通,为私家藏书提供大量的收藏来源。反过来,私家藏书所增加的需求,又刺激了刻书业、印刷业、装潢业、图书销售等经济生产领域的繁荣。

把私家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可深入探讨私家藏书在长期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文化积淀。并从文化的视角,对藏书楼、藏书印、图书交易等物态文化,对藏书措置之术、藏书风尚和藏书习俗等行为文化,对藏书楼命名的目的、藏书印文反映的意绪、藏书的心态等心态文化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些新的答案。比如,揭示藏书楼的虚拟与实构;对私家藏书习俗和藏书家嗜好作出有异于前人的、较为合理准确的解释;透过表象,挖掘藏书家深层的文化心态,区分其正面的、积极的心态,或者消极的、变异的心态,由此把握私家藏书不同发展路向的根源;阐释私家藏书在促进不同文化层之交流和保存、传播文化遗产的巨大社会功能,等等。总之,从多重视角研究私家藏书,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为藏书史、书史研究开辟了新道路,而且为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这是我个人有切身体会的认识。

3. 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的结合

以往文献学只讲校勘学史和注释学史,学术史只讲主观分析,各讲各的,成为两条道上跑的车。李学勤先生对学术史这种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术史不仅要从事思想、义理的角度去写,还要从文献、史实的角度去写,两者不可偏废^②。这种看法极其重要,从经学史的角度看,就要善于从文献的校释成果中分析各个时代对于经典不同的注释、校勘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从校勘注释的新内容看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发展,看学术史的转变。不同时代的版本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一部经学的发展史,正是历代学者运用文献考校和注释,为经学的前进开辟了道路,并赋予新的思想内容,从而完成了各个时代学

①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李学勤:《谈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15日。

术的新陈代谢。因此,文献学应该在这方面为学术史作出说明。

文献学史研究也只有结合经学史或者其他学术史的背景,才能真正说明各个历史时期文献学发展的原因以及对学术史的推动作用。例如,北宋二程、南宋朱熹都曾改易《礼记·大学》的文字,并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与《论语》、《孟子》组成“四书”。朱熹的《大学章句》不仅改易了文字,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还补写了所谓“格物致知”的第五章。这些文献校改上的变易,如果不从宋代理学思想兴起、发展的需要上分析,便难以说明其文献整理、校改工作的原委和意义。文献学研究只有和经学史或其他学术史结合,才能清楚地看到历代文献校注、考辨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才能深刻说明文献学研究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4. 文献学研究要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

以往的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很多关涉社会民生、生产生活的古代文献不受重视,有的长期被打入冷宫,得不到应有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从科技方面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领先于世界的,其中的天文历算、数学、医学、农学、建筑等领域尤为突出,并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文献。比如,明清在建筑技术方面就有许多文献资料,其中清代的匠作则例已引起国内外不少专家的注意。清代匠作则例记录了清代园林宫殿、城墙营房、河工海防、军器武备等建筑器物用料的规格尺寸,用工的种类、数量及价格运费等数据,这批文献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是研究清代建筑、经济、军事乃至社会政治的重要资料。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学者梁思诚就对《清工部工程做法》这一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著成《清式营造则例》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图解》二书。上世纪末,由王世襄先生领衔,开展对清代匠作则例资料的整理和影印,至今已出版了汇编5卷^①。这些材料也引起了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注意,自2001年起和清华大学合作开展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在德国召开了“中国匠作则例: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这表明匠作则例的研究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匠作则例外,当然还有大量科技文献值得整理和研究,如至今还在服务于现实生活的中医文献。此外,经济方面的、艺术方面的大批古籍文献也都有待文献学界的关注和探究。

5. 文献学研究要注意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结合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古文献数据库和网络的不断建设,大面积实现了传统文献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体现出存储量大、管理便易、阅览便捷,以及检索功能、统计分析功能、对比校勘功能大大增强等优势。这不仅是载体的转换、检索手段的变化,更是传统文献学方法论的一场革命。

^①王世襄主编:《清代匠作则例》第一卷、第二卷,河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清代匠作则例》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河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

新世纪的文献学研究还要进一步开发文献数字化的各种功能,发挥其超越纸质文献的优势,为文献学研究服务。第一,在研究文献的生产、流通、整理、保护等问题时,要把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结合起来考虑,充分发挥电子文献在古籍保存和流通上的优越性。第二,对于古文献数字化的开发和改进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完善。比如,进一步减少古文献数据库的错误,提高可信程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数据库分类标准,使同一类的古文献数据库逐步实现标准和格式的统一,以便于传播和利用;进一步开发古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作用。第三,将电子信息技术引入考证过程,发挥“e 考据”的作用^①。概括而言可以有三个层面的利用:一是广泛利用电子文献的检索功能,收集考证所需的各种材料。二是通过广泛检索词语在不同文献、不同语境中的涵义,从而准确训释有关字、词、句的意义,以纠正前人的误解,达到疏通文献、释疑解难的目的^②。三是利用电子文献的检索功能,全面核对材料,对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史源学的论证,发现疑误,将考证引向深入,最终取得新解。

6. 文献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结合

文献学研究不仅要有实证技能,要研究文献、文献学发展史,还要有理论研究。正如刘乃和先生所说的:“要把文献工作当作一门学问,只作事务是不行的;要把文献工作当作具有科学性的学问,只凭技术也是不行的。”她从学科方向,以及目录、校勘、辨伪、注释等专学的实际研究,说明“研究历史文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理论和观点的问题”。并指出:“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首先就是要指导研究方向的问题。”^③

那么,历史文献学理论要包括哪些内容呢?我想至少应包括理论基础、理论遗产、基本理论等三大部分。

第一,理论基础是文献学理论体系赖以存在的科学依据,是指导文献学理论不断发展的方针。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唯物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理论遗产是指我国古代的文献学思想。在文明社会,任何理论都具有继承性,当代历史文献学理论的建设不仅要从实践中总结,还要继承先贤的思想遗产。古代文献学家不仅为我们留下大量文献整理的遗产,而且在文献整理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总结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形成了丰富的文献学思想。古代的文献搜求与典藏思想、分类叙录思想、校勘思想、辨伪思想、文献阐释理论、金石考史观念,积累是非常丰厚的,值得作深入的发掘和阐发。

①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4-65页。

②参见黄灵庚:《屈赋“汤禹”小议》,《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6日。

③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0-122页。

中国古代文献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文献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必须结合文献学史的研究加以总结。古代文献学思想的研究,既可丰富文献学史的内容,又可深化对于古代文献学内涵和价值的认识;此外,还可以为建立当代文献学理论体系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可以为当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提供直接的借鉴,因此是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第三,基本理论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本体论主要在于文献观,要解决文献概念、文献的本质和特征、文献的形态、文献的价值和功能等主要问题。

文献学的认识论,要明确学科的定位及文献学的学科结构;要讨论文献学本身及所属各门专学(目录、版本、校勘,等等)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实践意义和历史发展规律;要思考文献学与传统文化,文献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等课题。

文献学的方法论,要研究文献学的传统方法,文献学与边缘学科的关系,文献学对当代科技成果和国外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吸收等问题。要考虑如何利用当代科学技术成果、引进边缘学科和国外文献学学科的理论及知识来更新我国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改进和发展文献学研究的传统方法。

7.域外汉籍研究与域内西书研究的结合

域外汉籍的搜求、整理和研究成为近些年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已有多家出版社在进行域外汉籍的收集和出版,影响较大的是2008年由西南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本辑收书百余种;据称,这套文库将在此后5年内收集出版域外汉籍珍本达2000种。这个数字已达目前所知的域外汉籍珍本总数的80%。域外汉籍的研究也成就斐然,有不少论著发表,中华书局自2005年以来陆续出版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1-5辑,2007年出版了《域外汉籍研究丛书》,收入5种研究专著。应该说,域外汉籍的研究方兴未艾,前景非常可观。新闻出版总署的柳斌杰署长曾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序言中,将域外汉籍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称之为“汉籍之路”,以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比拟,充分说明了整理研究域外汉籍的重要意义^①。

当然,在重视域外汉籍的研究时,也不能忘记对域内西书这批重要历史文献的研究,因为这批文献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十六世纪后期,大量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掀起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自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20世纪上半叶,一方面由于西方传教士输入基督教文化的总体目标,一方面由于中国士人自徐光启的“会通中西”^②到梁启超“多译多

^①参见柳斌杰:《汉籍之路》,《光明日报》2009年2月10日。

^②王重民辑:《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74-375页。明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中谈到如何对待西学时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读西书”^①的需求,西学文献在中国输入长达 300 多年,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根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②、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③、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顾燮元《译书经眼录》^④、徐惟则《东西学书录》^⑤、平心编《全国总书目》^⑥记载统计,从明季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 300 多年间,在华编著、翻译的西书达 7600 多种。如果再加上明清两代入华而流散、失传的西书,入华西学文献的数量会更多。除了用汉文著、译的西书,国内还保存有不少原版西文古籍,有的版本价值极高,比如代表西方最早印刷水平的“摇篮版”西籍,就有“西方宋版”之誉。这些文献是明清至 20 世纪初叶西学东渐的重要资料和历史见证,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全面考察域内西书的总体面貌,研究西书入华的路径、著译的各种方式、内容和影响,不仅是文献学的重要课题,也必然会推动学术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新进展。

8. 中外文献学研究方法的结合

历史文献学研究,不仅要继承弘扬我国传统的文献学方法,还要注意了解、学习国外的文献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西方近代的文献考据早在 14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便初见端倪,当时有一批学者关于古希腊、罗马经典的考证,他们的考辨目的和方法影响了后来欧洲的文献考据学派。随着 18 世纪法国碑铭文献学院成立、19 世纪法国著名的巴黎国家文献学院成立,欧洲的文献考据盛行,而法国的文献考据学则具有一流的水平。19 世纪中后期,文献考据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导学派,德国的兰克学派就因高度重视对各类公私档案、文件、契约、信函、证件等史料的考证整理,去伪存真,而以史料学派著称,对西方史学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虽然在进入 20 世纪中期以后,各种史学新流派纷纷兴起,西方的文献考据学派逐渐没落,然而文献考据工作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从西方汉学研究的著述中仍可以看到许多文献考据的成果。国外的文献学理论和方法源流有自、积累不凡,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进行必要的比较研究,取其精华,以丰富我国的文献学理论。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轻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开展了初步的工作,这是本学科值得高度期许的一个发展方向。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院

①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上海时务报馆,1896 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

②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

③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 年。

④⑤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 年。

⑥《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 年。